

第七十六號

日二十月一十年二廿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送藍普森公使歸國

再談談怎樣提倡科學研究

專門人才的培養

荅燕樹棠先生

無爲與有爲

通信 (一) 如此牛津！

二二 更正

蔣廷黻

汪敬熙

顧毓琇

霍六丁

區少幹

劉
威

畢樹棠

寄售及代定處

[illegible]

送藍普森公使歸國

蔣廷黻

藍普森爵士在中國作了七年公使，現在快要歸國了。這七年之內，中英關係的轉變何等的重要，藍普森公使的成績何等的偉大。

當民國十五年冬季藍普森公使來華接任的時候，中英的關係正到危急的關鍵。彼時全國人民都爲「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所麻醉，且認英國是帝國主義的罪魁：我們以爲不打倒英國，我們絕無翻身的日子。同時通商口岸的英國報紙也在那裏盡牠們謾罵的能事，把國民黨和學生看作新拳匪，惟獨炮艦政策足以對付。在民國十五年的冬天和十六年的春天，倘藍普森公使的判斷，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關係必致大決裂，就是全盤遠東問題也可演變到一個不堪設想的田地。現在呢，英國政府及藍普森公使已屢次的具體的表示中國的富強就是英國的利益，使這富強得實現，英國願意盡友誼的協助責任。這種態度，我們完全了解且感激。現在我們知道英國不但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障礙，且是一種助力。從此以後，中英的友誼及合作只須維持和培養，其基礎已在這最近七年穩立了。

我們如要了解這七年中英關係轉變的重要，我們必須

簡略的回溯以往的歷史。直到道光時代——蒸汽機已成新工業的中心的時侯——我們尙是閉關自守，獨自尊大。英國曾於乾隆末年及嘉慶中年兩次派和平使者來華。他們的外交目的雖多，總括言之，不外善意的勸中國加入國際大團體，放棄孤立的小生活而過世界大生活。到了十九世紀，無疑的我們絕無力閉關了，我們的出路在國際團體之中，不在國際團體之外。所須要的改革是極大的，就是整個文化的改造。此中艱難困苦簡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不幸，中英雙方的政治家把十九世紀事業的性質看錯了，致于發生兩次的戰爭。在我們這方面，我們的錯處是不知世界大勢，逆潮而行；在英國那方面，他們的錯處在眼光的短狹。

近百年英國對華的政策是一貫的以推廣商業爲前題。英國確實無土地的野心和陰謀。馬戛爾尼爵士在十八世紀末年就對乾隆皇帝的政府作過這樣的聲明。我相信此中並無絲毫的欺僞。因此英國人覺得他們對於中國沒有一點良心的不安。加之自拿破侖戰爭以後，英國的紡織業有一日千里的進步，海外的商場成爲迫不及待的需要。亞當斯密

士的經濟自由主義，經過喀蒲敦的宣傳，簡直成了英國的天經地義。英人覺得商業的推廣不但是良心所許可，且是文化的使命。倘中國人施以抵抗，這就是中國人的頑固，應該用炮艦消滅的。英人不知道商業的推廣及這種推廣方法在中國這方面可以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的不安。譬如一口通商改爲五口通商好像是極高尚的文化事業，殊不知這個改變廢了從江浙經江南過梅嶺到廣東的通商大道，而那些開旅館，作担夫的人就變爲失業份子了。倘若英人彼時知道這種社會的惡影響，他們也會置之不顧，認爲與他們無關。天津條約許了英國汽船往來於牛莊，天津，上海之間，於是中國沿海的海船及沿運河的沙船都被這種競爭壓倒了。在同治初年，這些廢船的桅木，如森林一般的，從吳淞口到鎮江，排在英人的面前，英人惟自慶他們運輸事業的成功，並責望中國政府維持治安，不讓失業的水手生事。

爲英國航業開闢這個新路線的是額爾金爵士。他訂了天津條約以後，路過上海的時候，洋洋得意的向英國商會講演說：我們外交家及軍人替你們打了先鋒，你們應該繼續努力，最後你們的機製品究竟能否戰勝中國人的手製品，那全靠你們自己去決定。額爾金爵士是講究政治道德的

；他在上海對英國商人作這個演說的時候，他無疑的想他的天津條約是逐條逐款都合乎基督教義的。他的聽者的感想更不必說了。以後的英國公使如威妥瑪，巴夏禮，朱爾典都出自一個模型。總而言之，十九世紀英國在華的事業就是拿英國的機製品來戰勝中國人的手製品。好了，中國人的手工業節節敗北了，但是他們終久也無能力買機製品了。手工業及農業是中國經濟的兩大支柱，倒了一個，其餘那一個也不能支撐這個大廈了。我這話也不可說得過火：中國經濟的崩潰是個極複雜的問題。外人經濟的侵略不過是其原因之一。並且我們倘自振作，如日本一樣，也不至到如今這個田地。不過這個經濟侵略究竟是我們今日的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我們原先不願加入這個國際團體；英國硬把我們拉進去。如同一個人不願意加入一個會社，他的朋友簡直用武力把他拖進去。這個朋友似乎應該盡點責任，告訴他這個會社的性質，及會員必須有的資格。英國在華的外交家，因爲看重了商業，簡直看不見別的了。所以直到近年，英國政府絕不作點文化事業。連留學一事，美國政府，日本政府都提倡過，惟獨英國政府到近來始注意及此。

因爲以上的原故，藍普森公使到中國來的時候，中英

的關係是那末樣的危急。當然，鮑羅廷及其同志與民國十四年十五年反英的空氣是有很大關係的，但如土地不適宜，鮑羅廷所撒的種子也不至有那樣豐富及那樣快的收穫。國人尙記得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事件及沙面事件及所引起的香港罷工風潮。十五年又有蕩縣的案子。藍普森公使到中國的時候，革命軍已佔漢口。他到了中國，就逕赴漢口，與陳友仁外交部長接洽。他們談了什麼，我不知道；不過藍普森公使於十二月十七日離開漢口，十八日英國外長張伯倫爵士就向列強提出對華的新政策。無疑的，這個政策是藍普森公使未到中國以前英國政府就定了的；無疑的，英國政府深信他與這新政策表同情且有執行這政策的能力然後委任他。所以他的使命就是執行這個新政策。

那末，這個新政策是什麼呢？牠包括六要點。（一）英國願意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二）英國絕無強以外人的統治加諸中國的志願。（三）中國修約的志願是正常的。（四）舊約未修改以前，英國願意關於條約的權利略爲通融。（五）在中國未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國就願意與中國維持親睦的關係。（六）華府會議所通過的海關附稅，英國願意中國即時起始征收。

這個政策發表以後，中外多表示懷疑。國民黨的當局

一則疑這政策是拿來作一時和緩空氣用的，一則嫌這政策不澈底，且過於空泛。國民黨的態度至少關於一點是看錯了，那就是關於海關問題，英國明白的表示中國宣布國定稅則的時候，英國希望列強共同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在此以先，讓中國即開始征收華府會議所通過的附加稅；這是很澈底，很具體的提案。但是國民黨積疑太深；鮑羅廷復從旁破壞新關係的推展。十六年正月初遂有強佔漢口英租界之事。這個時候，英人主張以武力對付「暴徒」者正不少。英國政府及其駐華代表雖一面調兵保衛上海公共租界，一面又於正月二十八日致函南北兩個政府的外交部，作進一步的政策表示。（一）英國願意承認中國新式法庭的司法權。（二）英國願意承認中國的國籍法。（三）英國在華的法庭願意實用中國的新民法和新商法。（四）在平等條件之下，英國願意讓中國政府向英國僑民征稅。（五）中國頒佈新刑事法典的時候，英國在華的法庭亦願意實行。（六）租界的政府可修改。（七）英國在華的傳教及教育機關願遵守中國的法律。外國在中國受了挫折以後而繼續讓步：這是初次。二月十九，英國正式退還漢口英租界。十七年年底中英簽訂關稅條約，正式承認中國關稅的自主。十八年，英國退還鎮江租界。十九年，

退還廈門租界及威海衛租借地。同年，中英訂定退還庚子賠款的辦法及其用途。二十年五月，中英法權草約成立。直到現在，退還租界及租借地者尚只有英俄兩國。其他國家尚未聞有所表示。

藍普森公使的秘訣在乎不以中國的國家主義為英國之敵，反引以為友。在最近這兩年，已起始利用英庚款來作

再談談怎樣提倡科學研究

(一)

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的觀念就是：「沒有儀器，不能做研究工作；沒有巨款，不能購置够用的儀器。」研究所是力求買的儀器多。凡是有點志氣的大學沒有一個不是力求儀器費愈多愈妙。一個大學的理學院各系也沒有一個不是出力爭分儀器費多的。朋友們往往說：「你的儀器多當然可以做些研究了！」近兩年教育部刊行的「化學討論會報告」及「天文數理物理討論會報告」，其中各研究所各學校自己報告自己近況，是不是像「臨潼門寶」一般，各自詳述所有的「儀器法寶」！

這個錯誤的觀念似乎是十數年前無能而有名的科學名家創立的藏拙妙策。但是國家受害却不少了。那一個研究

建設及教育事業。

在我國歷史過程這個當兒，英國政府及其代表願意協助我民族基本事業的完成。這真可算為「友邦」了。

我們雖不願意藍普森公使離別中國，我們借此機會祝他一路順風。

☆

☆

☆

汪敬熙

所，那一個大學，沒有好多華麗的櫃櫥，裝滿了從外國以高價買來的儀器？但是有幾個人是實際在那裏用儀器工作？有幾件儀器不是擺在那兒做學術機關的裝飾品，任他慢慢老朽呢？研究的結果能够使我們覺得這些款項不是浪費嗎？

我的一位朋友批評這個錯誤的觀念最是「一針見血」。他說：「科學家的儀器，同木匠的刀鋸一樣，只是工具而已。如無人用，買他做甚！」我們可以補充着說：「刀鋸不能自己造成抬椅，儀器自己也不能產生研究的結果。」

總之，提倡科學研究，以尋人才為第一要義。找到人之後，并按着他的需要去買儀器，去買他需用的工具。

如此，則買來的儀器件件得用，款項不至於浪費，並且可希望有研究的結果出來。

這點簡單的道理一經道破，是大家可以承認的。那有些有名而低能的中國科學名家當然是例外，當然我們不能希望他們同意的。

不過有人說，爲教學而用的儀器是不能不買的够用。此說也有可議之處。現在所用的教學生做實驗的方法，只能訓練學生一點用手的技巧，并不能使他們領略科學方法之真義。只爲教一點技術而費巨款買儀器是得不償失的。如果大學教授能努力做研究工作，給學生一個樣子看，比能對學生教多幾個實驗的技術，在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及領略科學方法的意義上，影響大多了。教學生用的儀器愈複雜，學生愈是只見技巧，而不見實驗法之真義。若是買來的儀器是專爲做實驗給學生看，更是不值。

SHERINGTON 說過：實驗表演越是做的好，學生所得愈少。況且從看表演所得的，本來就不多吧。

(11)

但是怎樣找人才呢？

我們先說幾個消極的條件。第一，絕不可只憑名氣大。我國學術界仍是幼稚，得名太易。從來沒有做過

研究工作的人，只要寫幾篇通俗的文字，便可成爲科學名家；或者寫幾篇甚長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也可變爲科學名人；或者經報紙或朋友吹噓吹噓也可得名。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我國這些科學老名家，一大半是徒有虛名。把這種只有虛名的人用在研究所或大學的重要位置上，絕非提倡科學研究之道。用此種人是阻礙科學研究的發達最有功效的方法。

第二，絕不可用只是讀書多而未曾做過研究工作的人。我們從前認讀書即是求學，讀書多便是有學問。讀書多但是「食而不化」的「兩腳書櫥」，在從前可以被認爲有學問的人，給他以機會。現在我們要知道，此種人是絕對不能對於智識的進步，有點兒供獻的。這種人，我們只好勸他另尋與他才能相合的工作。研究與教學的職業是與他不合的。

第三，絕不可用中才而勤力的人。我們對於用功的人從來是有點兒景仰的。我們都以爲智力雖不高，但是努力用功便可有成。這個意見是錯的。在下棋，十個低手敵不住一個高手；天資不够，只努力是絕無成高手的希望。在科學研究也是如此。EDISON 是說過他的工作之成功，是由於「一分神來，九分汗下」。天資中平的人

是得不到這「一分神來」的！在前數年，不妨鼓勵天資中平而努力的人。這是與「千金買千里馬骨」一樣的用意。以後我們只能與聰明而用功的人以研究的機會。

在積極方面，我們以為研究所及大學找人，應以人所發表的工作之質與量為標準。質尤重要過量。要知道人的工作之質和量，主持研究所或大學的人，當然要做一番人才調查的工作。如果肯用這一番力，並且肯詢問國內外與他同行的人之意見，再能自己同他有個人的接洽，自然可以選到適當的人。如果肯如此審慎，方是找人，而不是如現在這樣每學年開始的時候亂拖人了！審慎找人是提倡科學研究的最緊要的初步！

有適當的人，方能有研究的結果，方能給有才能的青年以科學的訓練。

(二)

找科學人才這件事，比為女兒找丈夫，更是困難。因為科學人才實非容易找的。這種人才是國家應該加意培養的。

研究一種問題，必須能够在一個地方，繼續十年以上，努力工作，方能有效果。所以絕對不可把科學人才也看做學術機關的裝飾品，只願搶來撐門面；搶到之後，就一

點研究的機會不給他。也絕對不可因為黨派的原因，省界的不同，個人間感情之不融洽，不給能研究的人以研究的機會。更絕對不可以因這些原故，將一個已經創立了實驗室而且有結果出來的人，趕出他的實驗室之外。這種事都是使一個科學人才在精神上物質上，受無限的苦痛的；而且是受了之後，只能將這些冤氣吞下肚去，一點社會上的同情得不到的！這是毀滅人才的無上妙法。

所以我們希望，主持研究所大學的人，不但要擇人審慎，而且要能培養人才。培養人才，第一須要給他以研究的機會；第二須要使他能安心長久工作。

研究的機會，是須要教課少，雜事少，開會少，酬應少，而且有一筆可靠的款項。這筆錢數目並不要多。

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有本領的人並不需要大筆的錢；要求大筆款項的人未必有本領。

研究機會的重要，是人人可以了解的。長久工作的重要，就不大為人所注意了。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起大學教員搬來搬去之不當；他就說：在中國現在，儀器應該隨着教員走。這種辦法，固然可以免得儀器鏽爛及買重份的儀器的損失。但是這位朋友實在是不知道在中國創立個實驗室的甘苦。一次搬動，至少須費半年或一

年的時間，方能工作。在這死氣沉沉的北平城內的國立大學，至少須費一年以上的時間。在首都更難說了。這種時間實在妄費的可惜。顯是因爲搬家，而須切斷舊日的工作，再找新路走，更是苦痛！

(四)

以上所說的話，是甚簡單，並且我們也曾說過。簡單的話甚難得人聽從。我們「人微言輕」，也難得爲人所信任。現在我們引兩個外國科學界名人的話，或者我國的名人能相信點兒罷。

一位是現在德國 HEIDELBERG 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曾得過 NOBEL 獎金的——PHILIPP LENARD。在他那本 GROSSE NATURFORSCHER 一本書上（九六—九七頁），論 NEWTON 與美國皇家學會的關係，他以爲英國皇家學會使 NEWTON 答復那些關於顏色問題的討論，太妄費 NEWTON 的時間了。他以爲科學的進步全係來自人的工作，而不來自學會，無論這學會的會員

專門人才的培養

在本刊第七十一號上，我曾討論到專門人才統計的重要。統計乃指已有的專門人才而論，並且統計只能注意到

大體上是如何好。一個學會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及促進這少數的能求得新智識的個人之工作。

一位是現在英國 CAMBRIDGE 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也是曾得過 NOBEL 獎金的一 LORD RUTHERFORD。他在今年九月九號出版的 NATURE 雜誌上，有篇評論 LENARD 這本書的英譯本的文章，他以爲上述的 LENARD 的意見是甚對，並且英國皇家學會現在的目的就是如此（三六八頁）。科學研究以人爲重，是這兩位都承認的。我國的名人聽了他們的話應該也以爲然罷。

「人本主義」是提倡科學研究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我國這幾十年來，提倡科學研究之失敗，都是因爲不信這個主義。我們儘可以造房子，買儀器，購圖書，儘可以費幾十百萬的錢；如果不以人爲重，這錢只等於白白花掉了而已！我們應該醒醒了，我們應該少注重物的方面，應該注重能用這些物質材料做工作的人！

一九三三，十一，二。

顧毓琇

「量」的多少，不能指示出「質」的好壞。從國家的立場看，我們需要的專門人才，量要多，質亦要好。要又好又多

的專門人才，便需要適當的培養了，普通人以為專門教育同普通教育一樣，在學校讀完書畢了業就算成功，這是誤會的見解。我個人以為專門人才的培養，大的可分三個階段：

(一)未畢業前——注重學術

(二)新畢業時——注重經驗

(三)已畢業後——注重經驗與學術的互相發明

在未畢業前，基本科學同專門知識都是偏於學術方面的。學校課程無論如何注重實驗，總不外乎基本的訓練。

因為專門的農工等等事業，都是千頭萬緒，詳細的部分，學校教育是無從教起的，並且教了也未必有益處。等到畢業的時候，這些未來的專門人才，纔正式踏進專門事業的境域去。學校教育猶如旅行指南，加了插圖或是風景片的，而畢業以後纔真正親臨其境。初到異鄉的時候，或者覺得地陌生疏，旅行指南所大書特書的名勝風景更是不易找到。經過了一番辛苦，這位候補專門家認識了現實的一切。他有把握了，他認識了他的本行。這是從學校教育進而完成社會教育的一個步驟。這種情形，學社會科學的畢業生亦會遭遇到，但是農工專科的學生，所感遇到的更為着實。

我們必需注意到一點：專科學生畢業後到社會上服務

的時候，他們專門的範圍一定更為狹窄，所以他們對於一部分的知識跟着經驗而增進，而對於基本的原則或者反會疏忽。但當他們的經驗逐年增加時，範圍亦漸擴大，而對於本行的基本知識亦會有豁然貫通的一天。

從新畢業生到老畢業生，便是從低着頭得經驗到豁然貫通回味到學校教育而重新理舊書的一個階段。至此專門學術與專門經驗方始有互融相會互相發明的機會。

以上大略講了培養專門人才的步驟。

到底誰去培養呢？

第一階段的責任，自然是專門學校的。國內現有的大學工科，有十幾處，如交大，北洋，中大，浙大，平大，清華，武漢，山東，東北，同濟，中法，焦作，金陵，南開等等。農科有中大，浙大，平大，河南，山東，金陵，嶺南等等。平均每處畢業生以五十人計，則每年工科畢業生約六百餘人，農科約三百餘人，共計約一千人。以連續服務年限三十年計算，則共得約三萬人。假定新畢業生平均年齡為二十五歲，練習工作期間為五年，則三十歲時可擔任正式專門工作，服務三十年，六十歲時可以退休。三十年後每年退休約一千人，適與新畢業生之人數相等。

根據本刊第七十三號君達先生「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日本自辦學起到一九二五年止，共計國立大學工科畢業

生約九千人，農科畢業生不及三千，共約一萬二千人。東京帝國大學始創於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約爲五十年。故日本農工畢業生平均每年約爲二百四十人。近八年來，每年以畢業生一千人計，得八千人，連前統計數共爲二萬人。所以我們上面所說三十年後有三萬專門人才的預算，比較起來亦不算少。又據君達先生文中報告，日本政府中的專門人才約有四千多人。所以我們若有一個培養專門人才的五年計畫，亦可以達到這個數目字。

從人數而論，現在的大學農工科可以够了。

從品質而論，我們自然希望辦工程教育的人要十分努力。最近我們有幾位朋友預備發起工程教育討論會，我想這是很有意義的。

第二階級，便是怎樣去訓練新畢業的農工專科學生。他們所需要的是經驗，是實地學習的機會，他們不是先要一個位置，一隻飯碗。學了機械辦文書是不對的，學了開礦做會計亦是冤枉。我們對於這種新畢業生，不必希望他們用其所學，且爲他們謀一個地方學其所學，已經是愛惜專門人才的德政了。

對於這種訓練，我們現在的政府機關同實業界亦都漸漸提倡合作。今年暑假，建設委員會同交通部都招考了電

務技術員。這些技術員考取以後，就分發到電廠或是電話局電報局實習。這是很好一個例子。還有杭州電廠今夏招考了十名大學畢業生去訓練，以兩年爲期，訓練好了自己再到別的電廠去。這種爲國家訓練人才的工作，我們確應該加以稱讚的。

鐵道部向來是錄用交大的畢業生的，我們希望他們明年能照交通部建設委員會的辦法公開考選各大學土木科的畢業生。全國經濟委員會今夏亦用公開考試的方法錄用大學畢業生去實習關於道路的工作。

從訓練專門人才的目光看，我們需要專門的事業。國內沒有新式的電廠，我們的電機畢業生，便沒有實習的機會。國內沒有新造的鐵路，我們的土木畢業生，便沒有實習的機會。

有許多門類的專門事業，我們國內仍然太幼稚，於是乎有了四十多年的留學歷史以後，今年夏天政府又考送留英留美的公費生了。我們瀋陽的新式兵工廠斷送於日本以後，我們又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鎗炮製造。我們的上海北平南京天津受了敵机的威嚇以後，我們又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飛機製造。這些無非要完成極少數專門人才第二階段的訓練。

借外國的設備，完成我們專門人才一部分的訓練，這是急來抱佛腳很可憐的辦法。多少年前我們的科學教育還不發達，所以不要說專門教育要仰求於外國，基本的科學訓練亦要到外國去學。現在國內的科學已經有了基礎，專門教育亦已漸漸發達，所以專門人才第一階段的訓練，或者可以自己擔負，而新派出的留英留美公費生可以出去完成他們第二階段的訓練，同從前比起來，未始不是一種進步了。

我們希望第二階段的訓練，逐漸可以由國內擔負起來。如同鐵路，道路，水利，電力等等，我們相信國人已能自己經營，自己研究。如煉鋼，如化學工業，如機械製造，我們在小範圍內亦有成績，而其範圍之所以不能擴大，物力財力的不足，或者比技術知識的缺乏更為重要原因。我們最差的是國防工業，因為飛機大炮造起來比較的煩難，並且同開礦煉鋼機械製造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階段的培養，怎樣可以完成呢？這是一個重要的

答燕樹棠先生

獨立評論七十四號燕樹棠先生的『平教會與定縣』一文內，涉及了我的職責，我願意簡明的說幾句話。

我不相信燕先生這篇文章是「有意中傷我」。因為他

問題。我們急來抱佛腳派留學生到外國去接受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訓練還可以；這第三階段融會貫通發明改良的工作，關係國家未來的生命，我們怎能永久委託於別國呢？我們歡迎國際技術合作，但是我們不能容忍不諳國情的客卿來發號施令。各國的技術顧問只是顧問，他們本不必越俎代庖。我們的技術專家呢，這第三階段的訓練便沒有人能完成麼？

最近洛氏基金會的鐵司台耳博士曾同幾位大學教授說他希望中國的科學研究能提高一個階段——從教授自己研究到指導別人研究。

哲學家懷悌黑曾經說：

『這世紀的最大發明便是發明了怎樣發明的方法。』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研究，大規模的研究。我們希望中國的科學家要聯合起來做偉大的研究。我們亦希望中國的農工專家要聯合起來研究實際的問題，為未來的專門人才作完成那第三階段的訓練的先導。 二十二，十一，五

霍六丁

所指責的如『縣長只本主義而行，並不依法辦理……』，與反動勢力互相呼應，而故意製造階級惡感階級爭鬥……，『等，很能構成重罪。他若有意中傷，他應當向當

局控告而不當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所以蔣廷黻先生誤會了燕先生『有點故意中傷』，我倒願意替他辯護一下。

燕先生說『平校畢業同學會會員（非『平教會員』）』『憑藉官勢以欺壓老百姓』，若有此事，頂好轉告當事人依法起訴，我決不袒護作奸犯科的人。我已經拘押過一個村的委員長，可以作個事實証明。再不然，只要燕先生個人通知我，我也要偵查一下，明白回答。可是有些事僅是私人的恩怨，我們也不可盡聽一面之詞。

至於說『面見縣長，非平教會員沒有機會』。這你有點誤會或誤信了。舉例說吧：我到貴村清風店去過三次，在那裏親自接見過無數次的鄉長副與人民，而貴村並沒有平教會員（燕先生住清風店南關太平莊）。我又到過貴區寺邑，磚路，台頭，岸下，西板……等數十個村莊，這幾十個村莊，說也湊巧，只有一兩個是有平教會員的。

說我審理債務訟案，不依法辦理；我想和您打個賭：由五月截至九月底，受理了一百二十五債務案件內，您若能指出一案是不依法辦理，我便算輸。我前天到監獄視察

無爲與有爲

前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九號，得讀適之先生「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一文。當初看到題目，未嘗不使人暗

，民事押犯盡是債務案，當時很使參觀人感慨。至於發起的債務調解委員會，這是合法的，也是對債權債務雙方有利的。打官司雙方都化錢，而且往往是債權人不願打官司。至於委員會的人選；令叔父燕冠卿先生便是貴區三個顧問之一，當不致疑他會引起階級鬥爭吧。

至於增加人民負擔的話；去年地方支出（保衛團在內）是十八萬多；今年是十五萬多；共減少三萬四千餘元。在現在政令之下，我慚愧我只能做到如此地步。

其他的工作及理論思想問題，這裏不必多說了，有機會我再領教吧。

末了，我請問您一件事：您說：定縣以前數十名劣紳憑藉官府欺壓百姓，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他們還敢不敢？請指示給我。因為我們在國家人民的立場上，政治法律的責任上，都不許他們『憑藉官府欺壓人民的』，無論因此他們會如何的『發生厭惡，積恨日深，將發反抗的運動』啊！

（完）

區少幹

暗吃驚；但細細讀了內容之後，却又深感着適之先生近來的言論；見解更加深沉，立論更加務實了。這確是放開眼

請看過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我們農村的實在痛苦情形，和一個貧弱久亂的國家，達到安定富強的境地，所必須經過一段無爲的（撫養培乳的）歷程的歷史；而指給我們爲政者致力建國的一條大路。

最近復在獨立評論六十七六十八兩號裏，看到弘伯先生遠從法國里昂大學寄回來的通訊「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嗎？」之後，覺得弘伯先生實在淺看了，或竟是誤解了「無爲」兩個字哲學上的意義；并且忽略了有爲政治成功所必要經過的一個階級。我從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實際生活之下，體認出許多事實，和適之先生所說的話很相合的。我是擁護適之先生無爲政治的人，所以我便不能安於緘默了。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爲的撫乳培養不可！

「無爲」與「有爲」只是一個先後的程序問題。並不是兩個對立的體系。這是我們要深切認清的。

適之先生在他的文裏會很鄭重地反覆申明這「無爲」兩個字的定義，他說：

「古代哲人提倡無爲，并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爲，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爲。所以說：

「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以說：「不爲物先，不爲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爲的政治。

他又說：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爲政治的摩登說法。……

如果我們沒有認清了對準了這種定義來說話，便往往會坐了「無的放矢」的毛病。不幸弘伯先生的文章裏，往往不免如此。

如說裁兵，是要替被裁的兵想出路，如屯墾殖邊等，這當然在裁兵範圍之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無爲政治範圍之內。斷不是裁兵只是把兵裁了，便是無爲；而替被裁的兵想出路，便是有爲。適之先生在他的論文附記裏承認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也是無

爲政策之一。這就很可以明白無爲兩個字的涵義了。

又如弘伯先生他文裏有一段引証說：

請看我們四川的馬路。舉個極小的例來說，從產鹽有名的自流井到富順城，華里不過九十。（英里只三十

）在西方可以數月成之者，在我竟鬧了幾年。爲什麼要延長到幾年呢？因爲樹倒猢猻散。所以辦事人不顧那口好飲食，急急吞下。如果有人把這口好飲食給他們拿走，他們的把戲多得很，消極防不勝防，一轉眼便翻新花樣，另起名目，以求「生財之道」，結果老百姓的錢還是一樣地出，而難形的建設，可以作爲改良進步基礎的建設，連這點點也會沒有了。

這確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足以証明怎樣叫做「胡作胡爲」。怎樣叫做「往往擾民而無功」。

講到中國近年來都市的建設，和馬路開闢。我相信沒有任何其他一個都市，比得上我們廣州了。我們有自由開合的大鐵橋，跨過珠江，溝通河南河北。我們有一百二十尺闊的柏油馬路，并不比上海香港外人治下的地方失色。在這三數年間，我們有三千餘輛的汽車，在馬路上跑。我們有十二層高的建築物，這是曾受過中外人讚美的。但最近政府忽然有停止開築馬路的明令，那些預定在計畫內要

開築的，也一律停止：爲的是馬路兩傍的人民即使勉強有錢交給路費，却再不能勉強弄錢建築自己的舖屋。結果是當中一條好好的馬路，襯着兩傍拆得七零八落破敗不堪的爛屋，這不是又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嗎。

不要說「把政府權縮到警察權」是人家十九世紀的唾餘不足學；人家十九世紀爭人權的唾餘，我們到了現在才拾着了，而且還受了很大的打擊，和慘痛的失敗。我們現在的情形，豈只是「諸侯并起，民失所業，而大飢饉」。更够不上「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生者未起，……」這幾句話。在這種情勢之下，却不要經過撫乳培養的一個階級，便妄想「人人自愛而重守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便妄想「主持建設者，認真作事，將公事看成和私事一般重要，將公款用來和私款至少一般愛惜；不要再掛羊頭賣狗肉；消極不要再毀滅專才，積極還要培植」。這不是更「垂空文」嗎？就是人民要督責政府，這個督責的能力，也要在治安和公道底下才培養得起來。如果沒有確立這個督責權的基礎，謬然出來督責政府，那你只有準備遭殃而已。誰叫我們的國家落伍了這悠悠的一個世紀呢。

大約弘伯先生看慣了西歐的「土地辟，田野治」。和人家的瓊樓玉宇。回看我們這個東亞不知振奮的貧兒，鶉

衣百結，食宿無所。忍不住了，就要督促他馬上照樣建築一個瓊樓玉宇。他那懇切望治的心情，我們是十分敬仰的。但連教貧兒擠節儲蓄，都說不必，恐怕反而「欲速不達吧」。衣食足，然後可以言禮義。這雖是一句老話。但無論講什麼，都要先有了衣食才可。這個先後的程序，猶如鐵律一般，是不容倒置的。

適之先生說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登摩」說法」但在我們現在來說，我以為應該是：把政府的權力擴張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摩登說法。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還遠沒有做到警察權的境界。我們的農民納了正式和苛抽的賦稅之外，還要納土匪的「保護費」。我們四鄉的輪渡，納了正式船鈔稅餉之外，

如此牛津

廷黻先生：

獨立評論五十四號，載有顧克女士 (Gertrude M. P.

Cooka) 著，劉學濟君譯『那賢明的青年』和 (英人) 俊臣君的『跋「那賢明的青年」』兩篇短文，當時讀了，很覺得有點不自在。個人在牛津也讀過幾年書，對於牛津的情形，也略知一二，敢就所見，仍借貴刊發表，對於該文的幾點

還要納各地土匪的「行水」。他們整日整年的勞動，做到「腓無腋，脛無毛」，結果能够上餉納稅，已是萬幸。如果不幸還碰到些天災，那真是不知死所了。所以築路會要他們的命，盜匪會要他們的命，派兵勦匪，更會要他們的命。(共產黨的區域不計) 現時復興各地農村，最要緊的是給他們一個翻蘇的機會；最低限度使他們能够繼續呼吸，才可以繼續工作。所以我說：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為政治的撫乳培養不可。政府先把警察權做到了，然後才可以擴張到比警察權更大的權。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先做了「無為之為」，然後可以做「有為之為」。

二十二，十，廿五，

廣州市廣衛路半園區

劉 咸

感想。

第一，牛津大學學生會 (Oxford Students' union)

譯聯合會不十分洽當) 二月九號辯論的『本會無論遇了任何情況決不為王為國去打仗』 (That this House will in no circumstances fight for King and Country) 的那回事，實在值得不得若何的注意。我們曉得牛津學生會在每學期開

學的時候，每逢星期四都舉行辯論會，雖然常常討論政治問題，但他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練習學生的口才，和辯論的方法。辯論的題目，當然以能引人注意者爲上。這次的題目，總算是能引人注意了；但我們又知道牛津在校的學生，總共有五千多人，這次提案的通過，不過是以二七五票對一五三票的多數，就是三月二號（據牛津雜誌（The Oxford magazine）五十一卷十六號所載係二日非十號）晚上再行開會討論銷毀記錄的事，也不過以七五〇票對一三八票的多數，通過反對銷毀前案之建議。以七百五十人的比較多數，能代表其餘四千餘人的絕對多數嗎？能說他們都是「那賢明的青年」嗎？其實這種辯論，不過是一部分學生活動的一種，並不能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更不能對於英國的外交政策，有絲毫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舉動，祇能認爲係少數愛出風頭的學生幹的故事，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二，這次辯論題的要點，是「不爲王國去打仗，」這是句騙人的話。英國人不是喜歡打仗，那裏來那麼些殖民地。即如上次歐戰前，何嘗沒有一部人反對戰爭，迨募兵令下，投效者風起雲湧，結果能堅持主張，因非戰而下獄，像羅素先生又有幾人？這幾個血氣未定的牛津學生

，所謂的「那賢明青年」，說不爲王爲國去打仗，我們可以相信的他們過嗎？平時口頭說不去打仗，到了打仗的時候還是去打仗，不爲王去打仗，或有之，不爲國去打仗，恐怕時間還早得很呢！愛國心誰沒有？

再從人類的演化史上看來，人類的天性是好鬥的，戰爭並且是生物界現象的一種，沒戰爭就沒有進步。男子好鬥爭，女子也愛勇敢的肉體。這次牛津通過不打仗議案之後，就有兩個女學院各以大批白羽毛，致送學生會會長，默罵那非爭的爲不武。在一般人的心理，以爲女學生一定是愛和平，惡戰爭的，只要提議非戰運動，準可以得她們全體，或大多數的贊同，和稱羨。這次牛津的女學生却不然，因爲忠君愛國的思想，不但不贊助那擁護議案者，反送白羽毛默罵他們是膽小輩。可知這次議案，不但不能代表牛津學生全體的意見，且不能博得比較愛和平惡戰爭的女同學的同情。

第三，俊臣君在他的跋內，說這回事情，「實在值得中國人的注意」，並且進一步替我們出個主張，說什麼「無論情況若何，決不武力抵抗日本」，我認爲這句話是有絕大的危險性的，我要提示我們中國那賢明青年注意，切不要受他的麻醉。在強權即公理的世界，「尚未毀

滅以前，武裝是和平的保障以前，人類好鬥的天性，尙未全泯以前，不靠武力抵抗，但憑口頭正義和平，可保障己國的安全，可以阻止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嗎？那才是緣木求魚，自己騙自己的話，我們可不要上他的老當。我以爲中日問題最後的解決，不在國際聯盟，而是在喋血長城浮尸鴨綠江上。現在我們或不能戰勝暴日，但人心不死，終有算總賬的一日。中國九一八起至熱河失陷爲止，是喊着「

決不武力抵抗日本」的口號，結果是怎樣？是以東北四省的錦繡山河，拱手讓諸他人。上海一二八之役，是喊着「

「決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口號，結果是怎樣？是雙方打得落花流水，簽了停戰協定，上海表面上未損尺寸寸土。武力抵抗和不抵抗，差異如此，何去何從，不容躊躇，我們還說不要抵抗嗎？倭臣君越俎代謀，教我們要忍耐，「無論情況若何，決不武力抵抗日本」，未免太不忠實，太滑稽了。要是日本這樣欺凌英國，英國也決不抵抗日本嗎？倭臣君這句話，有搖動我們青年思想的嫌疑，大家要認清，要注意！我更希望我國那賢明的青年，要看清我們國家的出路，我們自身的責任，和外國人說話的背景，自己加一番思索，不要盲從倡什麼世界大同，國際和平，非戰非不爭的高調，濫調。這些思想，在幾百年後，也許可以達

到，不過在世界二次大戰，旦夕有暴發可能的今日，是不適用的。我們要求自身的解放，國家的安全，除武力抵抗外，沒第二個善法。

第四，再說到牛津學生會的非戰議案，不過是那麼回事，值不得我們的注意。他們在高說非戰入雲之後，又於五月四號晚上，作『廢除國際聯盟』（Th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should be abandoned）的辯論（據牛津雜誌五十一卷十九號），曾幾何時，出爾反爾，如其說主張非戰運動，不爲王爲國去打仗，是對的，那末就不該辯論廢除國際的問題。國際是世界上現在唯一的倡導和平，主張合作的機關，應該努力贊助，多方維護，使這根基未穩的幼稚組織，日臻鞏固，俾可以阻止一切戰爭的發生。倘若要廢除國際，發展帝國主義，那簡直就不必唱什麼不爲王爲國去打仗的高調。牛津大學這班二十多歲的青年，本來見解就沒成熟，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往往是矛盾的，值不得我們的注意。反正他們說了做了不負責任，壓根兒也影響不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所以政府當局，也讓他們胡鬧，不加干涉，認爲學生的舉動，不過是如此，所以牛津也不過是如此牛津。

總上述四點，我個人對於這兩篇短文的意見，都不敢